

十九世紀法國的殖民主張

——近代中法關係研究之一

陳三井

一、引言

大體而言，鴉片戰爭以前兩、三百年間的中法關係，主要是一種文化層面的關係，可以稱之為傳教為體，學術交流為用的一種對等關係。透過來華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教士，如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6-1610）、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熊三拔（Sabathinus de Ursis, 1575-1620）、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649卒）、日耳曼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鄧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西班牙人龐迪我（Diego de Pantoza, 1571-1618）、法國人洪若翰（Joan de Fontaney）、張誠（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白晉（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emare）等的介紹和影響（註一），一般法國學者文人對中國文化具有好感，並推崇備至。最顯著的例子是十八世紀法國啓蒙時代的巨靈——伏爾泰（Voltaire, 原名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在其著作中不厭其詳的提及中國歷史的悠久，幅員的廣大，以及制度的完善，把中國當作是鞭策歐洲「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巨杖。當法國人的祖先尚在阿爾登森林（Massif de l'Ardenne）（註二）茹毛飲血，到處覓食流浪時，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註三）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法關係，在本質上有了很大的改變。法國素有「教會的長女」（*filie ainee de l'Eglise*）之稱，由於她堅持以實力保護天主教的政策，所以教案不斷在華發生（註四）。法國當十六、七世紀之交，即從事海外殖民探險，在普法戰敗後，因為她想重振昔日聲威，要與英國在遠東一爭雄長，所以不惜與中國之間一再以兵戎相見，從過去的仰慕推崇中華文化

一變而為與中國的武力對抗鬥爭，這是中法關係史上十分不幸的一頁！

談近代中法關係，不能無視於法國當時所處的環境。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尤其自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之後，係西方帝國主義對外殖民擴張的極盛時代，殖民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角，外交的重心（註五）。列強在非洲的瓜分，英法在中南半島的角逐，均是此一事實的反映。

殖民既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政治的主角，外交的重心，因此談近代中法關係自不能不先探討殖民問題。而法國殖民之再興，除了茹費理（Jules Ferry）（註六）其人關係重大外，輿論本身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對此作一背景式的瞭解。

一、法國地理學會的影響

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受到某種「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的影響，因而製訂或修改其政策，這是政治學者所常強調的理論。法國地理學會對於殖民政策的影響，不僅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正是壓力團體影響決策的典型。

地理學會（Societe de Geographie）之在法國，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是旅行探航的最佳喉舌。在法國第三共和的前三年，它在殖民擴張方面尤其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探航的原始創意往往由這個學會所孕育，且第一次探航也多由它所策動。而當旅行家或探險者旅行探航歸來時，也常在學會中受到最熱烈、最具同情的歡迎。例如安鄰（Francis Garnier）探航湄公河歸來，即曾接受巴黎地理學會所頒發的金質大勳章一枚。（註七）。

法國地理學會（La Societe de Geographie de France）創立於西元一八二一年，一八七三年有會員七百八十人，至一八八一年會員已達兩千人。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的十年間，法國在巴黎以外的地區又陸續成立了十一個類似的地理學會。一八八一年，全法國地理學會共有會員九千五百名，約占全世界該項會員總數三萬人中的三分之一，高居世界第一。由地理學會會員人數之衆，足見法國當時風氣之盛。

自一八七一年起，地理學會在法國掀起一項廣泛的鼓吹對外殖民運動。誠如巴黎地理學會秘書長莫諾瓦（Charles Mamoir

）在一八七三年的一項報告中所指出：「對於其他民族的情況漠不關心，對於可能透過商務或殖民活動而發生關聯的僻遠國家之資源語焉不詳，於我們民族是危險有害的！」（註九）。

同樣的思想，可從安鄴的「印度支那探航記」（*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一書中獲得印證。安鄴對於法國自普法戰後從世界政治舞台上黯然退隱，表示無限的傷感。他語重心長的說：

「當一個人經過長期的海外居留，驟然回到本（法）國時，……他無法不因爲大眾對於『民族偉大』（*La grandeur nationale*）的冷漠表現，而感慨良深！他將幡然醒悟，他一向在海外所從事的奮鬥，他爲國家利益所做的一切防衛，似乎全然與此無關。這個過去喜好開拓冒險的國家，現在竟如此的自我退卻，甚至不想在外面爲他的自然活動（*Activite naturelle*）尋找一點食糧」。（註一〇）。

地理學會創立的宗旨之一，即在鼓吹旅行。隨著地理學會的蓬勃發展，其會員的觀念也逐漸由旅行而與殖民相結合。一八八一年，瓦倫西亞（*Valenciennes*）地理學會秘書長丕賓（*Bébin*）鑒於法國在歐洲之退縮，主張應轉向對外殖民。他大聲疾呼說：「爲了保持一個大國或成爲一個大國，一個民族必須對外殖民。那兒，是國家生機活力的源泉。……一旦我們所期待的事件完全實現，即是我們海軍軍旗停止向前之時」。（註一一）。

地理學會對於法國殖民思想，有首開風氣的影響，但大體而言，其影響仍侷限於團體之內。法國殖民思想的廣泛傳佈，則有待經濟學家的有力鼓吹及各界的隨聲附和。

三、經濟學家的鼓吹

當第三共和初期，法國鼓吹對外殖民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除「論辯日報」（*Le Journal des Débats*）外，期刊有「法國經濟學人」（*L'Economiste Français*，一八七三年創刊）、「地理評論」（*La Revue Géographique*，一八七七年創刊）、「雙世界雜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等，它們宣傳的共同思想，不外是挫敗的法國需要東山再起，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以及商務發展三項。

然而，談殖民擴張最具說服力的理論家，當首推一位年輕的經濟學者——列霍華·伯利俄（Paul Leroy-Beaulieu）。當其大著「論現代民族的殖民」（*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於一八七四年獲得法國政治及人文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頒以最佳學術著作獎時，這位才華橫溢、鋒芒畢露的得獎人只不過三十一歲。這位未來的科學院院士、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政治及人文科學教授，才是鼓吹法國對外殖民擴張的最有力代言人。

列霍華·伯利俄討論殖民的書，初版於一八七四年問世，正當法國普法戰爭新敗，不得不採取「退隱政策」（*La politique de recuilement*），以韜光養晦之際。根據列霍華氏的看法，法國雖遭挫敗，但並未懷憂喪志，挫敗也絲毫沒有窒息國人對外擴張的天才。法國有一個挽回此一不可彌補失勢（*de'ch'ance*）的辦法，那就是殖民。因此，列霍華氏在其書中鄭重呼籲：

「如果我們不殖民，在兩三世紀內，我們的國勢將遠落於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之後。殖民對於法國而言，將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要就是法國變成擁有非洲的強國霸權，不然便是在一、二世紀內淪為歐洲的二流國家」。（註一二）。

列霍華氏的成名之作，被譽為兼具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社會學家智慧的經典之作，我們可以從書中找到一個國家必須向外殖民的一切理由。就法國而言，這位殖民的第一號鼓吹者說：「唯有在歐洲以外，我們始可滿足正統的擴張本能。我們應該致力於一個非洲大帝國與一個較前者略小的亞洲帝國之建立」（註一三）。可見政治的因素——法蘭西的光榮和偉大，仍是法國對外殖民的主要考虑。

我們特別發現，在「論現代民族的殖民」一書的封面並加印有穆勒（*Stuart Mill*）（註一四）的一段「名言」：「以目前的世界情勢，我們可以肯定，殖民地的建立乃是最佳之事，可供一個古老而富庶的國家投資之用」（註一五）。而列霍華氏補充道：「殖民的真正關鍵，在於資金而不在移民。法國擁有充足的資金，可以任其自由流通，法國的卓著信用可以使其散佈到世界各個角落」。（註一六）。

就作者身份分析，列霍華·伯利俄是一位新聞從業員、教授、出版商，同時是研究院院士。他的文章從一八六六年起出現於「雙世界雜誌」，一八七一年起刊載於「論辯日報」。他也是「法國經濟學人」雜誌社社長，該刊物係於一八七三年四月十九日問世

。然而列霍華氏對殖民問題的興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時期。他曾於一八九七年撰文回憶說：

「從年輕喜歡作夢的時代開始，殖民問題即深深地誘惑著我們，好似個人實踐的唯一理想。而自一八七〇年起，殖民除了是個人的理想外，復顯現成為國家的理想」。（註一七）。

一、二十年來，列霍華氏所寫的衆多著作中，一再告訴讀者，殖民一直是他魂牽夢縈，耿耿於懷，始終無法分割之物。他自述說：

「隨著歲月的飛逝，我越來越相信，殖民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法國的重要性。每當機會來臨，我們就毫不遲疑的趕緊抓住它，透過言語和筆端向國家宣示它偉大的殖民使命。我們利用各種方式，例如報紙的專欄，或經典式的書籍，或聚會中的簡短致詞，乃至課堂的公開演講，再三的提醒法國，她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殖民強國，她可以也應該再成為一個偉大的殖民強國」。（註一八）。

列霍華氏雖然抓住每一個機會，透過各種方式，鼓吹殖民不貽遺力，但在法國第三共和初奠，亦即一八七〇年代的前期，無論在法國或在歐洲大陸，殖民擴張的觀念尚未普遍流行。這裡請看列霍華氏的有力見證：

「當一八七四年本書（指「論現代民族的殖民」）第一版問世之際，殖民僅祇不過是西歐一小撮人所關懷的問題。有的幾乎完全加以忽視，認為是時代錯誤（Anachronism）；有的乾脆放棄，默認大不列顛是個天賦獨一無二的島國強權。出版家很坦率的告訴我們，討論殖民的著作銷路並不理想！」（註一九）。

四、其他護衛者的聲援

如果說法國在一八七〇年代初期，在殖民鼓吹方面只有列霍華氏這樣一位「大師」型的強而有力代言人，那它的護衛者卻為數極多。

論法國殖民，根據墨斐（Agnes Murphy）（註二〇）的看法，夏爾姆（Gabriel Charmes）是學院派護衛者中的翹楚，他對殖民思想的傳佈居功甚偉，更是支持殖民政策的忠實信徒。

夏爾姆寫過一本討論殖民的書，名叫「外交政策與殖民政策」(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Coloniale)，一八八五年出版。這是他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三年陸續發表於「雙世界雜誌」的文章的結集。

像其他所有的殖民護衛者一樣，夏爾姆在論及殖民擴張時，把法國的政治聲望擺在考慮的首位。他無限感慨的說：

「我經常在想，法國如果對周遭國家在全球各地的角逐競雄一事，仍然保持漠不關心的態度，那她將很快的淪為二流次等國家。時間緊迫，因為不但角逐者衆多，而且競爭的程度將越來越激烈。競爭的對手防備著我們，嫉妒我們；他們想盡辦法要超越我們。所幸，我們仍然領先超前甚多。今後全仗我們自己的努力，一方面不要輕易被那些高明的對手趕過超前，一方面還要在亞洲或非洲創建一個並不遜於我們在十八世紀所曾擁有的殖民帝國，可惜的是我們讓它如此悲哀的衰頹」。(註二一)。

此外，夏爾姆曾於一八八〇年十月十九日的「論辯日報」這樣寫道：「我們不應該忘記，法國還有列·臥日山(Les Vosges)以外的邊界，同樣的事件可能發生在地中海，而帶來比發生在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指普法戰敗割地一事更加嚴重的災難」。(註二二)

據夏爾姆的看法，法國由於得天獨厚的海洋地理位置，她應該從事像殖民那種遠征的事業。談到越南的北圻(Tonkin)，他態度堅定的表示：「把高棉、北圻，乃至整個安南置於我們的統治下，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所擔心的只是本身的畏縮不前。強而有力的佔領北圻，對於我們乃是絕對必須的。因為，如其不然，我們早晚將被迫放棄交趾支那(Cochin Chine)」。(註二三)。

其次，迪松大學(Université de Dizon)教授葛發雷(Paul Gaffarel)也是一位殖民擴張的熱情辯護人。葛發雷生於一八四三年，與列霍華氏同庚，出身法國有名的高等師範專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是巴黎地理學會的會員，也是迪松(Dizon)地理學會的創始人及首任秘書長(一八八一)。這位名地理學家兼歷史學家對於殖民的看法，旨在為他的祖國帶來光榮和聲望。他如此主張：

「應該殖民，不惜一切代價的殖民；殖民非但不會危害國家，反倒是愛國的，並且是第一需要的」。「職是之故，應該用各種可

能的方法鼓勵殖民。立刻重新開始這樣的偉大事業。圍繞著我們國家播下新法國（*Frances Nouvelles*）的種子」。（註二四）。

在其著作「法蘭西的殖民地（*Les Colonies Françaises*）」書的導論中，葛發雷教授如此結論說：

「自一八一五年以來，這是我們真正參加了一次殖民再興。不論政治意見是同情亦或憎惡，公道自在人心！我們應該替那些願將法國的部份資源轉移到殖民這樣一種有用而光榮的事業的政府，講幾句公道話」。

「或許有人會問，自一八一五年以來，我們為那些失去理智的戰爭或笨拙的事業所損耗的人力、物力，於今安在？但如果我們拿為殖民地所耗費的極微代價，與收獲做一比較，結果正恰得其反！」（註二五）。

天主教傳教士，如拉布瓦頌神父（*L'Abbe' Raboisson*），也是法國對外殖民的鼓吹者。他所強調的，除了法蘭西的強盛、偉大和聲望之外，特別包含了天主教信仰的宣揚。

拉布瓦頌神父著有「關於法國殖民與殖民地的比較研究」（*Etudes sur les Colonies et la Colonisation au regard de la France*）一書，他這樣認為：

「法國該不該是一個殖民強權（*Puissance Coloniale*）？歷史上從未存在過沒有殖民地的強國。帝國的鼎盛往往與其殖民擴張的極限互為表裏；而帝國的衰落又常與其殖民地的喪失不謀而合。殖民的結果，使弱國的領土愈來愈狹小，強國的版圖愈來愈寬廣」。（註二六）。

五、結語

我們沒有必要，也無法將法國殖民的鼓吹者與護衛者一一列舉，詳述其主張。但由上面所引例證，吾人大致可以瞭解，法國從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到傳教士，他們所鼓吹的殖民政策，首先不外是一種聲望政策（*Politique de Prestige*），主要是為法國的將來而打算，不願意法國淪為二流國家，希望法國仍然保持殖民的一等強國。至於經濟的因素或戰略方面的考慮，尚在其次（註二七）。根據前述這些殖民黨徒的說法，法蘭西民族是優秀的殖民者，沒有別的民族堪與相提並論。職是之故，法蘭西很

明顯的應該成爲一個殖民強國。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法國，雖有這些殖民代言人的鼓吹宣傳，但不論就一般法國民意，或政界而言，大部份的法國人並不真正希望對外殖民擴張，其理由有三：第一，殖民遠征將轉移法國的復仇目標（德國），而這個目標一直是法國十年生聚教訓，臥薪嘗膽，所不敢須臾或忘者；第二，在一般法國人的心目中，對於第二帝國時代的若干次遠征冒險，特別是拿破崙第三之遠征墨西哥，大家不但記憶猶新，而且餘悸仍存；第三，最後也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因為殖民遠征勢將引發國際爭端，以當時法國的處境，這是她所不能不戒慎恐懼，引以爲慮者。

基於上述三點理由，法國有其不能對外殖民的苦衷。故一旦茹費理內閣把殖民思想真正付諸實際行動時，便遭遇法國國會的杯葛與輿論的反對了。

附 註

註 一：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民國十三年六月），頁三八，六九；王德昭，服爾德著作中所見之中國，

新亞學報，第九卷第二期，頁一七一—二〇六。

根據張蔭麟氏之統計，耶穌會士之來華者，明末以義大利人爲最多，清初以法蘭西人爲最多。茲列表如下：

國籍	明末來華者	清初來華者	共計
葡萄牙	6	4	10
義大利	8	1	9
法蘭西	1	7	8
日耳曼	2	2	4
西班牙	1	1	2
比利時	0	1	1
未詳	1	9	10
共計	19	25	44

參閱張蔭麟前引文，頁六八。

- 註二：阿爾登森林位於盧、比、法三國交界處，係法國人的祖先——法蘭克人的最早活動場所。
- 註三：王德昭，服爾德著作中所見之中國，新亞學報，第九卷第二期，頁一二二。
- 註四：參閱龔政定，法國在華之保教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五十一年。
- 註五：是即所謂「殖民政策的一窩風」(une rafale de politique coloniale)。Jean Ganage, L'Expansion coloniale et les rivalités internationales de 1871 à 1914 (les cours de Sorbonne.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Vol I. P 1.
- 註六：茹費理(Jules Ferry, 1832-1893)是一位性格專橫、意志堅毅的法國政治家，被認為是第三共和的三大締建者之一。曾任法國教育部長、內閣總理，是法國併吞突尼西亞、出兵北圻的主謀者。有關茹費理的生平，殖民思想以及對華政策，容撰文另述。
- 註七：拙文安鄰與中國、參閱「近代外交史論集」(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七月)，頁二七。
- 註八：A. Murphy, The Ideology of French Imperialism, (Washington, 1948), P.8; H. Brunschwig, Mythes et réalité de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français. 1871-1914 (Paris, A. Colin, 1960), P.23。
- 註九：H. Brunschwig, op. cit. P.23。
- 註十：Francis Garnier, 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effective pendant les années 1866, 1867 et 1868, par une commission française présidée par M. Douart de Lagrée (Paris, Hachette, 1873), conclusion générale, P.534。
- 註十一：A. Murphy. op.cit. P.19。
- 註十二：P. Leroy - Beaulieu, 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 Préface de la II^e édition。
- 註十三：Ibid。
- 註十四：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著有「歸納與演繹的邏輯」(Logique inductive et d'eductive. 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1848)等著作。
- 註十五：參閱 Stuart Mill,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liv. V, Ch. XI, §14。
- 註十六：Leroy-Beaulieu, loc.cit.

113. Leroy-Beaulieu, L'Algérie et la Tunisie, Préface à la II^e édition. P.V.
 114. 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 Préface de la II^e édition.
 115. Ibid, Préface de la 4^e édition.
 116. A. Murphy, The Ideology of French Imperialism, P. 176.
 117. G. Charmes, 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coloniale (Paris. C. L'evy, 1885), P. 306.
 118. A. Murphy. op.cit. P. 188, Brunschwig. op. cit. P. 27.
 119. G. Charmes,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 Extrait du Journal des Débats du 10 septembre 1822.
 120. P. Gaffarel,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Introduction, P. 4. et P. 8.
 121. Ibid, P. 16.
 122. Raboisson, Etudes sur les colonies et la colonisation au regard de la France, P. 2.
 123. 拉波瓦西和拉波瓦西關於法國殖民地的研究，巴黎，1885年。
 John F. Cady.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1954.
 Jean Chesneau,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vietnamienne, Paris, Sociales, 1955.
 Henri Brunschwig, Mythes et réalités de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français, 1871-1914, Paris, A. Colin, 1960.
 Jean Ganiage, L'expansion coloniale et les rivalités internationales de 1871 à 1914. Les cours de Sorbonne.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Paris.
 Masataka Banno (坂本武敏).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Yam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4.
 Lloyd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7.